

□ 林雅华

近代中国探寻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求索，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探寻中国学术话语自主性的重要历史背景。在此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贯穿古今中西的视角、贯穿时代发展的脉搏、贯穿中国问题的导向，就成为衡量知识分子之担当意识与文化使命的重要标准。

作为培训和轮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更要在理论修养、文化视野、思想格局方面具备深厚的学术底蕴。中央党校文史部的范玉刚老师，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

(一)

范老师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幼年之时就深受齐鲁大地儒家思想的熏陶，对中华传统文化颇有向学之心。“君子慎独”“孟母三迁”的家庭教育，给范老师打下了厚实的儒家精神底色与文人气质情怀。1987年，范老师来到吉林上大学，就读于汉语言文学系。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大学校园，洋溢着对于知识的渴求，同时也激荡着文学、艺术和美的时代氛围。大学时代的他就已深刻意识到，中国欲寻现代化之发展就必须具备中西会通的视野。正是因为如此，他非常注重西方经典的学习，并借助文学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在大学期间，他发表的论文《新时期探索小说语言变革倾向初探》，以小说的语言艺术作为进路，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化对于中国传统语言范式的变革，也分析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由于其独到的视角与开阔的思路，很快就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可以说，这篇论文开启了他面对中国问题，会通中西文化传统的研究路径。

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范老师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奋战在高等教育一线的中文系教师。两年后，他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的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他的导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尤西林。范老师在求学期间，不断深化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尤其关注西方现代性理论与文艺美学的结合视角，将文艺研究放在了一个更具历史感、文化感与全球性的思想语境当中，发表了多篇文章，如《庄子的技

与时偕行 矢志为文

——记中央党校范玉刚教授



艺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试析海德格尔技术之思》。从这些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会通中西的理论尝试。2000年，范老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成为黄克剑教授的首批博士生。在黄克剑教授的影响下，范老师更加坚定了融通中西、积极创新的学术信念。2005年，范老师的博士论文《睿思与歧误——一种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审美解读》出版。这部作品虽然探讨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美学思想，但是，通过引入中国传统形而上的“境界”之论，比勘海德格尔的“命运”之喻，思维辽阔，中西融通，引人深思。全书贯穿始终的对于技术时代人类境遇的深刻反思引发了学界的诸多关注。2014年，范老师出版了《西方美学专题十五讲》。本书以强劲的时代意识与美学意向，以历史化的叙述与文化间性的对话，集中展现了他多年融通中西文化传统的

研究和思考。

(二)

2003年，范玉刚老师来到中央党校文史部工作。多年来致力推进中国文化发展研究的胸怀抱负，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施展阵地。在党校主体课堂上，范老师就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趋势、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品牌建设等主题，展开了丰富而深刻的讲授。为了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当代文化问题、价值问题的研究，2004年范老师进入山东大学文艺学美学中心博士后流动站深造。两年后，他又前往广西南宁市良庆区挂职。一年多的基层实践工作经历，使得范老师对中国发展的现实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2008年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出版。这部著作系统探讨了中国的

范玉刚，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文化思潮和国家文化战略”项目首席专家，全国马列文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秘书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读专家。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曾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省部级课题10多项，参与多省市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评审。先后出版《睿思与歧误》《西方美学专题研究》《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文艺学的境遇与范式转换》等专著10部。多次荣获中央党校科研优秀奖、研究生院优秀教师、研究生精品课奖。

大众文化现象，提出：在大众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导文化的发展，在全球舞台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这种现实关怀与民族本位的战略思考，恰恰体现了他身上始终如一的使命担当。我记得，当年我来到中央党校面试之时，范老师赠与我的就是这本专著。而今读来，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激越澎湃的心绪。作为中央党校的教员，学术研究是根基，而家国情怀、民族使命始终是思想创新背后更为深刻的价值支撑。正因为这样一种信念，我成为了党校的一员。在这一点上，我始终感念范老师的精神引导。

2012年范老师的专著《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美学话语重构》进一步推进了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研究的思考。在他看来，卷入市场化逻辑的文化生产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视觉奇观，却缺少内在的价值维度。对于走向现

代化与世界舞台的中国而言，应加强开放语境中具备民族特色的审美话语建构。那么，如何才能在全球化时代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呢？面对这一问题，范老师将研究视野投向了更具实践意义的文化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研究。在此后数年，他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实地调研，并参与不同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项目规划和评审。2015年，由他执笔的《中国文化及其产业发展战略年度研究报告》出版，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在他看来，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成为创造财富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蕴蓄民族创新源泉和彰显中国价值与中国理念的重要载体。国际经验表明，文化及其产业发展体系的博弈，是国家整体实力的竞争。2016年，范老师出版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强国”战略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该

书获得中央党校科研优秀奖。这部专著从国家总体层面的“文化强国”战略出发，全面而系统地剖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及其“文化强国”的价值指向。在他看来，“文化强国”战略体现了我国文化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这意味着中国正从一个文化资源大国走向一个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影响力的世界文化强国。

(三)

可以说，范老师这么多年来学术探索，体现了一名党校教员的思想情怀与使命担当。他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不仅建基于深厚的理论分析，而且密切联系文化发展的实践，更加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文化话语建设的高度自觉。

作为一名党校的年轻教员，我时常苦恼于自己内心的浮躁。记得我曾跟范老师谈到这一问题，他听后淡然一笑，同我说起了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一句话：“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碎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

确实如此。对学者而言，想要坚守学术的尺度和学术的品位，不但需要心态的纯粹，更需要一种心灵的淡定和毅力。文化自觉，不仅是时代和国家民族的召唤，同时也是个人的自我期许。在范老师身上，我不仅看到了追求学术真理的勇气，也看到了他始终如一地为推进中国文化发展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文化研究的路径与审美文化的勃兴

□ 朔 风

严格意义上讲，包含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学派的“文化研究”，是西方理论旅行并与中国本土文化实际相结合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催生本土文化研究学派的形成中，推动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勃兴，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其讲述的一系列文化研究的故事，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彰显了本土文化研究的中国价值和学术追求，是增强中国学术自信、阐释中国审美经验的重要支撑。

究其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北美费斯克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在其理论旅行中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等基于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对大众文化作了批判性研究，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品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肇端于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特别是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英国文化研究史

上的一个大事件，以至“文化研究”这个概念本身也要归功于伯明翰学派。他们不满于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但他们继承了利维斯从社会功利方面看待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思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在早期他们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发展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他们认为文化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研究的主题不只是文化产品也是实践和生产、分配、接受塑造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语世界流行一种专注大众传媒和商品符号及文化消费的大众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以符号学和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为工具，以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的阐释为诉求目标，通过对社会日常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凸显大众在符号消费中积极的“创造性”“艺术性”和“审美感觉”，以期为大众的消费行为和商品符号乃至人生和生活实际寻求意义。这种凸显大众积极主动性的文化研究，有意无意地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商业流行文化的批判，作为张扬他们文化研究而进行批驳的靶子。其中尤以费斯克因其在学者中的“影响”和“备受争议”而引人注目，成为这一类文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费斯克以其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立场和对大众

文化的躬身践行等，来反驳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他不认为大众仅是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在大众文化中隐藏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进而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

当然，作为多学科、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不止以上三种西方理论资源，它们更多的是在早期阶段，对中国的审美文化研究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文化研究影响下，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审美文化”研究深刻地回应了19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消费文化的流行，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加急剧形成的。“审美文化”涉及美学领域中许多前沿和交叉问题，展现了美学研究的活力和创造力。其研究极大地改变了康德美学等经典审美话语独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主导性地位的境况，使中国美学研究在面向现实审美境域中呈现多元化趋势，“审美文化”研究广泛涉及了当代社会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艺术园区建设、各类审美文艺活动、数字艺术奇观、文化娱乐综合体等，加强了对大众文化发展和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的理论引导，在推动中国美学学科自觉中带来了现实中审美文化的勃兴，既为当代美学研究拓展了美学视阈，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上接1版) 贵阳正在探索推进城乡“三变”改革，目的就是要通过更有利的制度安排，用股权纽带将各方利益联结起来，让全体人民在城乡“三变”改革中成为“股份市民”“股份农民”，成为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的“股东”，通过树立“股东”意识、权责意识，积极参与到产业链发展和价值链分配上来，从而推进城乡公平共享发展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

城乡“三变”改革的内涵实质。一是推进资源变资产，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对城乡资源的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等进行确权、赋权、活权，通过成立社区经济组织、市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让群众享有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二是推进资金变股金，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在法律的框架内整合城乡建设和发展、扶贫开发等财政资金，集聚群众的分散资金，撬动各类社会资金。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按照集中投入、产业带动、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方式，集中投入到集体经济组织、企业等经营主体。三是推进群众变股东，让增收的渠道多起来。通过让群众参股入股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稳定增加群众特别是低收入困难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城乡“三变”改革的基本原则。推进城乡“三变”改革，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以群众为主体、企业为龙头、产业为平台、项目为载体、股权为纽带、共享为目标。在此基础上，强化“五个坚持”。一是坚持法治思维，维护群众利益。充分尊重群众和经营主体的意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依法依规有序推进，不搞强迫命令。防止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少数人侵占、支配集

体资产，维护群众的集体经济收益权。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强化组织推进。根据地域和群体实际，按照适度规模、先易后难、全面推进的要求，灵活采取资金、产权、经营权等多种入股方式，构建稳定、差异化、可持续的发展体系。三是坚持统筹协调，汇聚各方合力。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协调好企业、群众、集体经济组织等各方的利益关系，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耦合性，汇聚改革的强大合力。四是坚持底线思维，抓实风险管控。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国有资产不流失、群众利益不受损五条底线，着力防范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资金安全风险、资源破坏风险。五是坚持城乡融合，加快全域实施。促进城乡要素优化重组和双向流动，实现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优化配置，推动城乡“三变”改革全面、全民、全域、全景实施，加快产城园景深度融合、城镇乡村一体发展，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的美好蓝图。

城乡“三变”改革的关键环节。一是让群众资产可入股。通过政策引导，吸引群众自愿将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知识产权等入股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股份权利；通过政府优先配置资源和资金，让城乡低收入群体享有股份权利，使群众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实现“人人有股”。二是让入股资产可增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政策优势，选择商业价值高的产业和项目，选择有社会责任感、有实力的经营主体，搭建产业发展平台，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养生度假等

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产业，让群众的股份实现增值。三是让资产收益可分配。让群众按股权比例获得收益。建立公平、透明、合理的股权进退机制，确保入股公平、退股依法。政府或集体配置给低收入群体的股份，待低收入群体收入达到一定标准后按章程逐步退出。

城乡“三变”改革的价值追求。一是激活城乡发展的新动力。抓住城乡资源分散、资金分散、群众分散的主要问题，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最大限度把城乡资源整合起来、资金集聚起来、群众组织起来，提高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水平，激活城乡资源要素，赋予群众更多的财产性权利，不断增强企业、群众、集体经济组织等各方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全市人民最广泛、最深入、最主动地参与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实践中去，增强公平共享的发展动能。二是构建共同富裕的新机制。以股权为纽带，构建发展共建、社会共治、成果共享的机制，实现联股联业、联股联责、联股联心，努力打造经济发展的共同体、社会秩序的共同体、利益联结的共同体，让群众在共建中公平共享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和成果分配的权利和机会，逐步建立“先富带后富”制度，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发展新路。三是推进巩固执政基础的新探索。发挥党在政治引领和制度安排上的优势，把基层组织、企业、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城乡“三变”改革，产生共建共治的良性效应，让基层百姓在发展共享中自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作者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